

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

石莹

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,它位于汉水与长江的汇合处,是全国水陆交通干线的交叉点,而汉口是武汉三镇的商业中心所在。

当前,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潮流中,武汉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“两通”为起点,振兴武汉经济的改革方案。即从搞好交通、搞活流通两方面入手,带动武汉经济的全面发展。目前它在活跃经济,繁荣市场方面已经初见成效。这在武汉,尤其汉口,是有其深厚历史根基的。可以这样说,清代前期汉口镇之兴起,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,也正是“两通”发展的结果。因此,回顾这段历史,或许对当前武汉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借鉴。限于篇幅,本文仅先就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、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试作探讨,以就教于方家。

一、汉口的兴起

唐宋以来,武汉一带一直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商业中心所在。武昌、汉阳、刘家隔、金沙洲等都因商业先后繁荣^①。汉口的兴起则相对晚些。明初还是“未有人住”的“芦洲”,天顺年间(1457—64)始有居民,半个多世纪后的嘉靖四年(1525)才有1396户人家,2489间民房^②。但自明中叶开始,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。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进步,长江及汉水流域上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,迫切需要相应的集散市场;而原有的商业中心刘家隔,已在万历年间(1573—1620)因附近河道淤塞而衰落^③。于是大批商货纷趋汉水下游入江处,比刘家隔更具地理优势的汉口镇遂应运而兴。但是,最初的汉口,以汉水南岸、龟山以北之狭长地带为主^④。商业发展起来后,缺乏伸展余地的矛盾日益突出,人们才逐渐向当时比较空旷的汉水北岸寻求发展。然而,这里东临长江,南濒汉水,西北为湖沼,三面环水,地势低洼,“每值夏秋水涨,四面巨浸。”^⑤因此,解决水患问题,成为汉口能否发展的关键。明崇祯八年(1635),由汉阳府通判袁焕主持,在当时的汉口镇北修筑起一道长堤,名为“袁公堤”,以防御后湖之水南浸^⑥。从此,北岸的水患大为减轻,“居民渐集”^⑦,经济迅速上升,并最终超过南岸,成为汉口的主体。到明末,这里已是人口2万余,“商船四集,货物纷华,风景颇称繁庶”的长江中游一大市镇^⑧。故有汉口“肇于明中叶,盛于(天)启、正(崇祯)之际”^⑨的说法。入清以后,由于四川、湖南及本省周围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展,秦岭大巴山区的逐渐开发,以及长江上游川江的开通,国内市场的扩大,汉口与其他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更为广远,市场商品也更加丰富。于是,以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上下游间,长江与湘江流域以及与汉水流域间的贸易往来空前活跃。汉口镇终于依靠“两通”,在人们不断克服水患的过程中,扩大和发展起来,成为清前期连接四川、云贵、关陕、中南以及东南诸省广大地区的交通枢纽与新兴的商业巨镇。

二、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繁盛

马克思说:“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,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。”^⑩两者相辅相成。汉口镇发展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。明末清初,这里曾因兵燹,受到很大破坏,但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周围地区经济的发展,使之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。清代前期,汉口不仅恢复了昔日繁荣,而且成为“人烟数十里,贾户数千家。

藩商典库咸数十处,千樯万舶之所归,宝货珍奇之所聚”的“九州名镇”之一^⑪。康熙前期,著名学者刘献庭在所著《广阳杂记》中,就曾对汉口的重要经济地位作有如下评价,他说:“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,而云贵、四川、湖南、广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江西之货,皆于此焉转输。虽欲不雄于天下,而不可得也。天下有四聚,北则京师,南则佛山,东则苏州,西则汉口。然东海之滨,苏州而外,更有芜湖、扬州、江宁、杭州以分其势,西则唯汉口耳”^⑫。可见,汉口之繁盛在康熙前期已经显见,并已实际上起着“九省通衢”的作用。此后,经康、雍、乾三朝的持续发展,到乾隆十年(1745)间,这里号称“户口二十余万,五方杂处,百艺俱全”,成为“通省市价之所视为消长,而人心之所因为动静”的商业大都会^⑬。在乾隆四十九年(1784)成书的《大清一统志》中,汉口已被称之为“往来要道,居民填溢,商贾辐辏,为楚中第一繁盛处。”^⑭十年后,湖广总督毕沅在其奏疏中亦称它是“江湖数千里,商帆佔船,千万成群”^⑮。而著名史学家、方志学家章学诚所描述的乾隆末年汉口镇商品市场,则更是“品物畅茂”,“繁盛极矣”。其间“居奇贾化之贾,比屋而居;转输搬运,肩相摩,踵相接”;“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,特形异物,来自远方者,旁溢露积”,使“五都之市,震心眩目”。呈现于人们眼前的是商品集散、交易的一派繁忙景象。其主要街市,“上自桥口,下自(至)接官厅,计一十五里,五方之人杂居,灶突重沓,嘈杂喧呶之声,夜分未靖。其外滨江,舳舻相引,数十里帆樯林立,舟中为市。盖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部之物,无不取给于汉镇。”而外省所需之大量物品,也都在此采办、转输^⑯。

商业如此兴盛的汉口镇,作为清前期国内四大市场之一,它的繁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?根据现有记载,首先是它的商品种类非常丰富。对此,章学诚在乾隆末年所撰《湖北通志检存稿·食货考》中曾有很详尽的记载:当时汉口市场上从各地汇聚而来的商品,包括有农、林、畜、副、渔产品、手工业品、矿产品及其他各类杂货,可谓门类繁多,品种齐全。依其类别粗分之,计有食盐、粮食、竹木、纺织品、药材、山珍海味、干鲜果品、糖、香料、茶、酒、毛皮、纸张文具,以及铜、铁、锡、石膏等矿产品、煤、炭等燃料,还有烟草、鱼类、金银珠宝及其他物品共18大类。各不相同的大小商品中,有具体名称者230余种,其中,纺织品种类最多,有60种左右;盐、粮、茶、酒、药、糖、鱼类等日常生活所需食品合计约52种;文具纸张、矿产品、竹木、毛皮、煤、炭等约49种;山珍海味、干鲜果品、香料、烟草、烟具等约56种;贵金属及珍奇玩好约20种。不少商品的高低档次与花色品种各不相同,以适应不同层次的消费水平,满足多种需要。其产地广泛分布于全国大多数省区。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口商品市场的繁盛。

其次,从汉口的主要行业、大宗商品及流通量看,市场规模已相当可观。据乾隆十年湖北巡抚晏斯盛《请设商社疏》记载:清前期汉口市场经营的各类商品中,以盐、米、木、花布、药材、典当六行为最大宗^⑰。

1. 食盐。两淮是清代最大盐产区,湖南、湖北例食淮盐,汉口是其“泊集分销”之地,因而每年在此集散的引盐数量相当可观,成为市场上的大宗商品。据雍正十年(1732)统计:“湖北一省,每年约销淮盐三十五、六万引,又带销引盐四万道,合计不下四十万引。……至楚,俱在汉口盐店分发行销”^⑱。加上在此转运的湖南盐引,雍正朝,仅两省“额销纲盐”即有774,137引^⑲。按雍正年间每引344斤折算,汉口淮盐的年吞吐量达2.6亿余斤。又据乾隆《两淮盐法志》载,乾隆五年(1740)以前,“淮盐之行楚”,“计正带引”,已是“九十余万引之盐,总集于汉口一处”^⑳。这样,以乾隆朝每引364斤计算,年吞吐量已达3.3亿余斤。即使按两湖应行淮盐数计算,每年进入汉口的淮盐亦有78万余引^㉑,约2.8亿余斤。此外,楚省作为淮盐销售之畅岸,每年运至汉口融销的他省引盐也有相当数量,少则几万引,多则十余、二十万引^㉒。因而,当年泊于汉口的盐船非常之多,每年在此分销的淮盐约占其总销售量的一半左右^㉓,被视为“销盐第一口岸”^㉔。故乾隆《汉阳府志》称:汉口“盐务一事,已足甲于天下。”如此巨额的食盐固定在此集散,汉口在淮盐运销中的地位,及其市场容量之大,出入货币之多,是可以想见的。这对汉口镇本身的繁荣,也有不小的作用。

2. 粮食。清前期两湖、四川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地,每年外运米谷非常之多,汉口作为汇聚分销之所^㉕,粮食贸易相当兴盛。其来源中,川、湘米粮数量最多,史籍中“川米连樯而至,米价平减”,湘米“运往汉口一带者,帆樯络绎”的记载屡见不鲜^㉖;加上本省部分州县运来的米谷;陕西及汉水流域贩来的各种杂粮^㉗,使汉口成为货源充足的米粮集散市场。因而,乾隆十年晏斯盛称:汉口“地当孔道,云、贵、川、陕、粤西、湖南处处相通,本省湖河,帆樯相属,粮食之行,不舍昼夜”^㉘。乾隆末,一次失火即烧毁粮船

一百余号^②。可见,汉口市场粮食的年输入量相当大。其销售大多是经长江运往江苏,供应江、浙、闽三省的粮食市场。故康熙年间已有“湖北运江浙之米,即系湖南运下汉口之米”的说法。雍正初,又出现“江浙之米历来仰给于湖广,湖广又仰给于四川”的记载^③。由于地区差价较大^④,汉口粮市上,官籴之外,私商云集,“搬运甚多”;其富户规利,贩米动盈千万^⑤;连盐商的回程放空盐船也大都加入运米的行列。所以,每年自汉口运出的粮食数量非常之多。如雍正十年迈往奏:“今查汉口地方,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初旬,外贩米船已有四百余号,而盐商巨艘装运者,尤不可计数”^⑥。雍正十二年(1734)五月,“江浙官籴、商贩,陆续搬运四百余万(石)之多”,至七月,“江浙商贩已运米五百余万石”、米价依然“平减”^⑦。因此,全汉昇先生在所著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中曾估算,这一年由湖广运往江浙的粮食约计一千万石^⑧,说明汉口作为大宗粮食贸易的重要中转市场,年吞吐量相当大。其次是供应本地市场。武汉三镇,尤其汉口镇发展起来后,“人烟稠密,日用米谷全赖四川、湖南,商贩骈集”,才使“米价不致高昂”^⑨。至乾隆十年,号称“户口二十余万”的汉口镇本身,也已日消米谷不下数千(石)”^⑩。据上所述,汉口在清前期已成为容量很大的粮食集散市场。清代的粮食贸易以南方为盛,南方又以长江流域为大宗,而汉口是其中最大的中转市场之一,所以必然出现十分兴盛的粮食贸易。

3. 竹木^⑪。古代社会竹木运输主要靠水路,位于长江、汉水交汇处的汉口很自然地成为竹木集散地。其木材主要来自四川建州、长宁,湖南浏阳、益阳、道州,贵州苗族区,陕西汉水流域及本省山区。上市品种有柏、梗、楠、松、杉、小杉、小溪木、中溪木及花纹板材等。竹子多来自两湖地区^⑫。交易场所在新淤成的鹦鹉洲北与汉阳之间的“内河”中,清中期以后货源日多,鹦鹉洲逐渐发展成最大的竹木市场,其次是白沙洲^⑬。关于交易数量,目前虽只见清初文人姚鼐途经此地时所写“巨木如山写蜀材”的诗句^⑭,但是汉口镇本身的发展、繁荣,大量房屋与船只的建造都需要竹木。康熙年间,黄陂、孝感、汉口、汉阳四属工商业界人士还组织成立了“鲁班阁”,作为“大木、小木、寿木、箱木、雕木五界工业集合之所。”^⑮可见,汉口的木材加工业有了较大发展。此外,江西木材商输资兴建的“临江会馆”也出现于清前期^⑯。所有这些,没有相当规模的木材交易是很难设想的。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也促使这一区域性木材集散市场日益兴旺。故乾隆年间晏斯盛把它作为汉口六大行业之一,当有充分根据。

4. 纺织品^⑰。作为汉口大宗商品之一,其花色品种最多。仅据章学诚所记,就有棉布、麻布、纱、绸、缎等不同品种;每种又依其产地、质地、颜色、花样、用途、特色等分为若干类别,总数不下60种。其中布来自安徽、湖北、江苏等省,麻织品产于湖南、江西,多种多样的丝织物及其制成品,则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江宁、苏、杭、湖州及河南开封、湖北荆州等地^⑱。至于本省所产,虽云梦、孝感等地有外地客商直接设店收购^⑲,每年进入汉口市场的产品仍然可观。如黄陂、孝感、沔阳、监利的布,通城的葛,荆州的绢等^⑳;还有当时颇受欢迎的汉阳布,据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28载,当年“四方来贸者,辄盈千累百,捆载以去。”但并不是直接外销,乾隆《汉阳县志》卷10称,这些布,大多先“买至汉口加染造”,经过加工之后,再销往秦、晋、滇、黔诸省。此外,在索河集和永安保集等中继市场,生意也很兴旺,居民“抱布而贸者,不绝于道。”商人可长年“收买白布,转贩汉口镇”^㉑。可见,汉阳布得以大量外销,相距很近的汉口市场作用颇大。汉口同样是各种纺织品的集散中心。

5. 药材。被当时人称为“药料香过岭”的汉口镇^㉒,自必是全国(尤其南方)药材的集散地之一。其来源,凡本省所能自产者,多由各府、州、县商人贩来,汇聚于此,其余则来自江西、四川、云贵、山陕、河南等省,还有来自关东的人参^㉓。作为汉口发展较早的行业,在清初顺治十三年(1656)就出现了专门的“药材行帮公所”,这是汉口现有记载中成立最早的商人同业组织^㉔。此后,康熙二十八年(1689)又有河南怀庆府的河内、武陟、温、孟四县药商组建的怀庆会馆,专门经营怀药^㉕。这些同业组织的相继成立,反映了汉口药材行业的兴盛。因此,它也是当时汉口镇的重要行业之一。

6. 典当业。随着汉口商业的发展,市场扩大,典当业也迅速兴起了。据晏斯盛乾隆十年所奏:汉口镇已有当铺39座^㉖。可与屡见记载的清前期汉口“随商典库咸数十处”的说法^㉗互为印证。因为“典商利重易生财”^㉘,少数地方官员也投资于这一行业。如湖广布政司官员黄焜,雍正间即在武、汉二县开有八所当铺,“令家人出入,与民逐利”,资本相当充裕^㉙。不过,当时典当一行还不足与前五大行业相提并论。

继清前期汉口六大行业之说以后,中期至近世又有“八大行业”之分。但说法不一,时间较晚^㉚,材料也

不足,这里就不多谈了。

总之,上述六大行业除典当一行可能由于资本及利润丰厚,受到晏斯盛等地方长官的重视而被列入外,其余五种都是清前期汉口市场上流通量可观,占有较大比重的行业,富商大贾多出于此。所以,从它们的经营情况中可以概见整个汉口市场的规模。从章学诚所记载的汉口镇丰富的商品门类中,亦能找出一些作用较大的重点行业,显示其商品流通的某些特点及地区间联系的广泛。此外,商人组织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,也是汉口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。限于篇幅,本文对此不再展开论述^⑧。

三、清代前期汉口市场的初步分析

首先,从商品的结构看,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。如前所述,清前期出入于汉口市场的商品,种类繁多,数量上以盐、粮、纺织品、竹木、药材等五种为大宗,因此汉口市场的商品构成中,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消费性商品占绝大多数,奢侈品所占份额很小。同时,生产资料类的商品也非常少,只有竹木、矿产品和纺织品可以作为手工业原料进行再加工。这样,从营销商品的经济用途看,汉口市场显然是经营民生日用品为主的消费市场。

其次,从商品流通的范围看,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。清前期除新疆、西藏、蒙古、宁夏、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外,全国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商品在此集散,甚至连“外洋”的哔叽、香料、鼻烟也自闽广贩运而来,长城以内的18个行省,都与汉口有或多或少、直接间接的经济联系^⑨。可见,号称“九省通衢”的汉口,在沟通国内市场的作用方面,可能比人们所惯称九省范围还要大。当然,商业往来频繁,联系比较密切的仍是川、陕、湘、赣、江、浙、皖、闽、广、云、贵等省,以及本省各地区。因此,清代前期人们将汉口作为全国四大市场之一给予高度评价,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

第三,从商品的来源和流向看,作为全国性市场,汉口的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。当年,商人从各地贩运大量商品汇聚于汉口,虽然也用于满足本镇及本省所需,充实零售商业,但更多的商品是在此中转外运。外地客商贩货来汉,也必然要再采办商品贩运回去。故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23称:“汉口为九州百货备集之所”,各地货物,“莫不运此转运分销”。它的六大行业,除典当一行外,五行都是以中转贸易为主,年吞吐量很大,因而投入的商人资本也最多,富商大贾多出于此。另外,汉口客商众多,在人口构成中占有很大比重^⑩,这也是转运贸易发达的表现。可见,汉口市场的繁荣主要得益于转运贸易,它的主要功能也在于充当多种商品中转批发的枢纽,服务于日益扩大的全国性商品流通。

对本省来说,汉口也同样是集散中转之地。湖北各地商人“所需于外部之物,无不取给于汉镇。而外部所需于湖北者,如山陕需武昌之柴,苏湖仰荆襄之米,桐油烟墨,下资江浙,杉木烟叶,远行北直,亦皆于此取给焉。”^⑪此外,还有通山、崇阳的茶叶,黄陂等县的布,荆州的绢,应城石膏,兴国竹子,鄖阳等处的猪^⑫,以及药材等许多本省产品,也都先运往汉口^⑬,除部分零售外,大多是在此转运,向外省辐射。然而,汉口市场的这种作用,离不开一系列外围城镇。清前期遍布于湖北各府、州、县的大小市镇非常之多,其中被章学诚逐一列出,比较重要的就有60余个^⑭。它们向汉口输出本地工农业品和劳动人手,再购回当地所需而不能自产的种种外来商品。因此,作为连接汉口与广大乡村集市的外围市场,它们的存在和发展,起着拱卫汉口市场的重要作用。

此外,汉口镇本身又是几十万人口的商业城市,在满足自身需要方面,也形成一个巨大的零售市场。具有满足本镇及周围地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,不断增强本省各地区及其与外省间经济联系的作用。由上所述,汉口市场的功能是多层次的。其商品的流通既有全国性的,如粮食、纺织品、药材、烟草等;又有区域性的,如食盐、竹木等;还有少数国际性的,如闽广商人贩来的海货;同时它还是本省地区性的商业中心与城市市场。所以,汉口是一个以中转贸易为主,具有多种功能的复合性商品市场。其繁荣对于活跃全国经济,进而保持封建政权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第四,从商品生产的发展水平看,汉口是典型的商业性城市。它的手工业,如纺织品生产,一般是街居女子“多事针黹,或为冠、为履,或成衣、成袜,皆晓夜为之,无事纺绩,近市镇故也。”乡农之家则“勤于纺织,虽老嫗、处女,寒暑无间”,“夜成匹,朝咸来贸”,“转贩汉口”^⑮。汉口市场的繁盛,不仅促使城居

妇女从事纺织品的加工业,也把乡居妇女的副业生产纳入流通轨道,使大量农家纺织品商品化。如汉阳县的南乡,“家家春作外”,以织扣布“资生”,“乡逐什一者,盈千累万,买(卖)至汉口加染造”后外销^⑥。与此同时,满足城镇居民生活需要的各种农副产品的生产也得到相应发展。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园艺业,如汉口的凤楼里与后湖,当年都有大片菜地,康熙年间还出现专做豆芽生意的“豆芽公所”^⑦。至于采药、捕鱼等业,尚属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式的生产,与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还有一定距离。

这里我们想着重谈城市作坊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。清代前期,在汉口商人会馆大量兴建的同时,也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的同业组织。如康熙年间在汉口联合各种铜器生产作坊而成立的江南、京南公所;从事木材加工的“鲁班阁”;以及乾隆年间出现的鞋业公所、袜业公所,银炉坊帮的同业组织“太清宫”等^⑧。至于铁器业,据嘉庆三年记载,汉口“有铁行十三家,铁匠五千余名”^⑨,说明商品生产在上述诸行业中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。另外,汉口的街市中,一是前店后厂式的店铺很多^⑩,虽然规模不大,仍属于商品生产。二是有不少专业街市,如剪刀街、衣服街、袜子街、打扣街、打铜街等等^⑪。据叶调元道光年间的记载,汉口袁公堤中段最繁冲处,“悉是木货、铜烟袋等店,椎斧之声日夜不息”^⑫。说明这些街市中就包括有某一行业的商品生产。

由上可见,清朝前期汉口商品生产的发展速度并不慢,但因起点很低,年代也不长,所以水平还很有限。所生产的商品大多都是满足本镇衣食住行所需的日常消费品。而且,从市场商品的构成看,这一时期的汉口市场上,纺织品、纸张等手工业品和茶叶、烟草等经济作物已占有相当比重,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国内商品生产发展的概貌。但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汉口以外地区,特别是品种繁多的丝织品,大多都来自苏、杭、湖州、江宁等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;布也有相当部分来源于苏、松二府。它们远销汉口,既反映当地商品生产的发达,也说明汉口与这些先进地区的经济联系正在加强。然而,汉口镇本身的商品生产,与其发达的商品流通相比,却显得相当逊色。在章学诚所列230余种商品中,本镇所产唯有部分酒、药、果品和鱼类,现有各种记载中,也始终未见有比较突出的手工行业或名特手工业品,同时期的手工业组织也明显少于商人会馆。因此,汉口镇虽然也有竹木加工业、铜器作坊、铁行、食品加工业、纺织及其制做等等手工业部门,但较之庞大的商业经济体系和繁荣的商品市场,它在整个城市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很小,远不如当时同属于四大镇的景德镇(以生产瓷器著称)和佛山镇(以生产铁器著称),也不如“天下四聚”之一的苏州(以纺织业闻名),从而决定了它的性质只能是商业性城市。表现在人口构成上,则是商人非常之多,在总人口中比重相当大,其中外地客商又占多数^⑬。于是,以外地客商及其资本活动为主要对象的服务行业迅速发展起来,遍布于汉口的大街小巷。构成了包括存储(邸店、行棧等)、搬运(码头工人及船工等)、促销(牙人、牙行)在内的一整套保证客商正常经营的服务设施,以及客店、酒楼、茶坊等为客商提供生活服务的大小店铺,形成日趋完备的服务网点^⑭,使这里以中转为主的大规模商品流通得以顺利进行。正因为汉口的商业特别发达,并有一系列服务行业,能够吸收大量人口就业,当地居民并不急于从手工业中寻求生计,因此在一定历史时期内,其商品生产的不发达是必然的。而且,由于汉口仍能保持其经济的繁荣,所以这种局限性在当时也并不突出。但从长远来看,只有商业繁荣,没有相应的工业做基础,这种经济构成必然会使汉口的发展后劲不足,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

综上所述,随着国内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,汉口镇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,终于在清前期上升为中转贸易为主的全国性商业城市,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日益增大。但这种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,不是建立在自身工业发展的基础上,而是各地区间经济发展起来后,迫切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强交流的产物。并且,汉口的这种中转贸易虽能保证商品的顺利流通,本身却基本不参与生产过程。所以,在当时历史条件下,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,只能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。

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刘献庭曾将汉口与北京、苏州、佛山等历史名城并列,称为“天下四聚”,即面向全国的四大市场。这可以说是抓住了它们的共性,但它们也各有其特性:北京是以政治中心为主,兼商业中心的消费性城市;苏州和佛山是手工业与商业并重的城市;汉口则是以商业为中心的典型城市。同其他三城市相比,又自有其特点。这种情况一直延至近代,外国租界出现于汉口,继之以张之洞于19世纪90年代在湖北陆续兴办近代工业之后,才开始有所转变。因此,从汉口发展的历史看,充分利用地理优势,面向全国,发展商业,这在其兴起时期无疑是十分必要的。它对于汉口经济地位的增重及其物质基础的奠定,有着巨大作

用,但绝不能到此止步。在“两通”兴盛起来后,必须狠抓工业建设,形成自己的拳头产品,这样汉口的发展才有后劲,整个经济才能真正起飞,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的。

注释:

① 后两处请参阅《嘉靖汉阳府志》卷3创置志;《雍正湖广通志》卷7山川志。汉口兴起时,这些地方已先后失去商业中心的地位。

②⑧⑪ 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12,汉阳县乡镇。

③ 据章学诚《湖北通志检存稿》(《章氏遗书》第4册以下简称《检存稿》)循良略,彭大科条载,万历四十一年由于“河淤,舟楫不通”,这里的商税已难于征收了。

④ 参阅《嘉靖汉阳府志》卷2方域志、卷3创置志;《雍正湖广通志》卷15公署;光绪《汉阳县志》卷1地理略;《汉口丛谈》卷1等。当时管理汉口的机构及官员均驻于汉水南岸。

⑤⑦ 范锴《汉口丛谈》卷1

⑥ 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职方典,卷1127《汉阳府部汇考·堤防考》;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15堤防志;《汉口丛谈》卷1等。

⑨ 康熙《汉阳府志》卷1,《舆地志·坊村引旧志》。

⑩ 《资本论》第3卷,第371页。

⑫ 刘献庭(1648—195)《广阳杂记》卷4

⑬⑰⑳㉑ 见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卷40仓储下,晏斯盛《请设商社疏》,其中“户口二十余万”的说法只是一个估计;另据民国《夏口县志·丁赋志》载:乾隆三十七年汉口仁义、礼智二司共有人口99481人,但这只是在籍人口,不包括众多的往来客商。

⑭ 乾隆《大清一统志》卷261汉阳府,关隘条。

⑮ 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廿日《湖广总督毕沅奏折》,转引自张国辉《清代前期的钱庄和票号》一文,载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1987年第4期。

⑯⑰⑱⑲㉑㉒㉓ 《检存稿·食货考》

⑳ 《雍正朱批谕旨》(以下简称《朱批谕旨》),雍正十年十八日湖北巡抚王士俊奏。

㉑ 见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(一),雍正元年六月廿日谢赐履奏。

㉒ 见乾隆《两淮盐法志》卷10成本,乾隆五年崔纪奏疏;及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卷12漕运。

㉓ 见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305,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己丑舒常奏。

㉔ 见注㉑及嘉庆《两淮盐法志》卷15融销

㉕ 据康熙《两淮盐法志》卷7额例载:顺治二年(1645)淮盐每岁额行正引141万余引,每引200斤,共约2.8亿余斤;康熙初,据《皇朝经世文编》卷49户政,盐课,包世臣《淮盐三策》载,计口定额的淮盐总数为200万引,合4亿斤;至乾隆朝,据许涤新、吴承明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》(人民出版社85年版)635—636页统计,淮盐年销量在6亿斤以上。故汉口所销占其总量的一半左右。

㉖ 见陶澍《陶文毅公全集》卷11奏疏,《敬陈两淮盐务积弊附片》;又,《李煦奏折》(中华书局1976年版)217页,康熙五十六年奏折亦称:“两淮行盐口岸,大半在于湖广”。

㉗ 见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(十三),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硕色等奏,《清高宗实录》卷247。

㉘ 分见《朱批谕旨》雍正十一年五月六日迈柱奏;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(十二)乾隆二十年十月五日陈弘谋奏。

㉙ 见钱泳《履园丛话》卷14《汉口镇火》

㉚ 《自治官书》卷6《折奏湖南运米买卖人姓名数目稿》;《朱批谕旨》雍正二年八月廿四日王景灏奏。

㉛ 据《朱批谕旨》雍正四年四月八日贵州巡抚何世基奏称,他沿途访问所得:江浙米价每石一两一、二钱,江西一两,湖广只八、九钱;又据同书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迈柱奏:当年“江浙米价较之楚省现贵三分之一”。

㉜㉝ 《朱批谕旨》雍正十年二月廿四日迈柱奏

③④ 见《朱批谕旨》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五日、七月八日迈柱奏。

③⑤ 见全汉昇《中国经济史论丛》第2册第573页(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年版)。

③⑥ 《朱批谕旨》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迈柱奏

③⑧ 晏斯盛所举六大行业中只提到木材,而章学诚所列汉口商品中,竹、木都有。实际生活中竹、木两种材料的用途也相近,且汉口竹楼很多(《汉口丛谈》中就有“瓦屋竹楼千万户”的诗句)故这里将竹木并为一行进行叙述。

③⑨ 见《检存稿·食货考》。关于湖北木材,同书还有杉木“远行北直亦皆于此(汉口)取给焉”,“崇阳多贩松薪”,“兴山、长乐、长阳出影木、黄杨”等记载。

④⑩ 参阅《武汉工商经济史料》第1辑,陈醒、陈立廉《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史话》一文;又,鹦鹉洲与白沙洲至今仍是武汉地区最大的竹木集散地。

④⑪ 《汉口丛谈》卷2,又据《宫中档乾隆朝奏折》(五十三):乾隆四十七年,为修运河大堤,官府曾在汉口市场采买同一规格的杉木8万根。

④⑫⑬⑭⑮⑯ 吕寅东《夏口县志》建置志

④⑰ 参阅注④⑮又据《夏口县志》建置志,临江会馆由来已久,嘉庆二十五年毁于兵的记载推测,它的兴建当在清前期。

④⑱ 晏氏六大行业中只有花布,但汉口市场上,丝、麻织物都很多,故合并为纺织品叙述。

④⑲ 据道光《云梦县志》卷1及光绪《孝感县志》卷5引顺治旧志。山西商人曾在这两县设店收布。

④⑳ 乾隆《汉阳县志》卷6城池

④㉑ 《汉口丛谈》卷5;又据叶调元《汉口竹枝词》(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以下简称《竹枝词》)第34首载:道光末,汉口以“山”为名的药铺就有十二间。

④㉒ 转引自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《〈红楼梦〉历史背景资料》之3

④㉓ 注④⑮所列康熙《汉阳府志》卷1;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12;《汉口丛谈》卷3等均有所载。

④㉔ 《竹枝词》第28首,其下有作者自注:“当铺向例月例三分”,至嘉庆十年才改为冬月利二分,所以该行业获利是很大的。

④㉕ 《朱批谕旨》雍正七年正月十九日迈柱奏

④㉖ 笔者所见,乾隆年间只有晏氏“六大行”一说;此后在道光末成书的《竹枝词》中,则将银钱、典当、铜铅、油烛、绸缎、布匹、杂货、药材和纸张作为清中期汉口的八大行业。但是这种分法把当时在汉转销仍然十分兴盛的粮食、竹木等大宗商品排除在外,选择似有不当,未能如实反映汉口市场的主要经营项目。民国《夏口县志·商务志》中,将盐、茶、酒、药、广福杂货、油、粮、棉花、纸张作为八大行业,这种分法,与晏氏“六大行”有一定渊源关系,但时间较晚,而且一些行业的升降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有一定联系。

④㉗④㉘ 关于清前期汉口的商人及其组织,以后将专文论述。

④㉙ 详见《检存稿·食货考》。广西一省虽未见具体商品,但《广阳杂记》卷4与注④㉔晏斯盛奏疏均将广西列为在汉转销商品的九省之一。

④㉚ 见严如煜《三省边防备览》卷11策略

④㉛ 见乾隆《汉阳府志》卷16风俗志;乾隆《汉阳县志》卷6城池;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卷1130《汉阳府部汇考·风俗考》。

④㉜ 包世臣《安吴四种》卷34《筹楚边对》

④㉝ 《竹枝词》第35首及其自注反映出一些这方面的情况

④㉞ 《竹枝词》第7首下作者自注

④㉟ 《竹枝词》第50首及作者自注

④㊱ 《雍正朱批谕旨》、《汉口丛谈》和《竹枝词》中有不少记载,这里不再详列。